



李达全集

汪信砚 主编

第十六卷



人民
教育
出版社



李达全集

汪信砚 主编

第十六卷



人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赵圣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达全集.第十六卷/汪信砚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01-016654-4

I. ①李… II. ①汪… III. ①李达(1890—1966)—全集 IV. ①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0277 号

李达全集

LIDA QUANJI

第十六卷

汪信砚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1

字数:500 千字

ISBN 978-7-01-016654-4 定价:15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

主 任：陶德麟 顾海良

副主任：骆郁廷 谢红星 汪信砚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于 青	乔还田	朱传荣	朱志方
向 荣	辛广伟	肖永平	沈壮海	李维武
宋镜明	陈亚明	陈鹏鸣	罗永宽	胡勇华
涂上飙	郭明磊	黄书元	颜鹏飞	

出版策划：方国根 洪 琼

编辑主持：方国根 洪 琼 李之美

本卷责编：赵圣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0ZD&062）最终成果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李达全集》（1-20 卷）的整理、编纂与出版”最终成果

目 录

入党自传(节录)(1949.12)	1
“湖大”人民工作的方向(1950.4)	9
做一个光荣的劳动知识分子(1950.4)	17
关于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的报告(1950.4)	19
自然科学与政治	
——在“科学工作者协会湖大分会”的讲演(1950.4)	27
在湖南大学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1950.5)	33
在湖南大学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的致词(1950.5)	36
如何研究马列主义?(1950.5)	41

社会发展史(1950.5)

第一章 绪论	49
第一节 学习社会发展史的意义	49
第二节 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观点	54
第二章 社会的构造与发展的理论	67
第一节 社会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	67
第二节 社会的上层建筑	73
第三章 原始共产社会	80
第一节 人类的来源——劳动创造了人	80
第二节 前氏族社会	84
第三节 氏族社会	87

第四节 原始共产社会的崩溃	92
第四章 奴隶制社会	95
第一节 奴隶制社会产生的前提及其发展	95
第二节 奴隶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	98
第三节 阶级、国家的形成及意识形态	102
第四节 奴隶制社会的崩溃	107
第五章 封建社会	112
第一节 封建社会的形成	112
第二节 封建社会的生产特征和剥削方式	114
第三节 封建社会的阶级、国家和思想意识	121
第四节 封建社会的崩溃	126
第六章 资本主义社会	131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131
第二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	134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与经济恐慌	136
第四节 资产阶级的国家与思想意识	138
第五节 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142
第七章 社会主义社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	146
第一节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	146
第二节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诸阶段	149
第三节 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卓越性	154
第四节 社会主义的国家与意识形态	157
第五节 新民主主义社会	162
争取亿万人签名(1950. 7)	173
为保卫远东安全与世界和平而奋斗!	
——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和朝鲜(1950. 7)	174
改进我们的教学工作(1950. 10)	176

在湖南长沙市河西区各届人民庆祝首届国庆节大会上的讲演词 (1950. 10)	183
办好毛泽东故乡的大学,这是我们最光荣的任务(1950. 10)	186
在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演词(1950. 10)	189
勇敢自信,决心打胜争取和平的战斗!(1950. 10)	192
新旧中国的国家机构(1950. 10)	193
为完成学校教学计划而努力(1950. 11)	198
为抗美援朝题词(1950. 11)	201
时事学习动员报告(1950. 11)	202
拥护伍修权代表在安理会上的发言(1950. 12)	211
关于平壤光复与目前形势的报告(1950. 12)	213
一切优秀勇敢的青年们投身到国防建设前线去(1950. 12)	216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会上的报告词(1950. 12)	220
在现有的学习基础上胜利前进! ——1951 年元旦献词(1951. 1)	223
推动湖大更进一步(1951. 1)	227
把爱国热情贯彻到学习和工作上(1951. 1)	230
在欢送参军会上的讲话(1951. 1)	232
《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1951. 2)	237
关于庆祝中苏盟约周年、抗议美帝劫持联大诬蔑我国、反对 美帝单独媾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报告(1951. 2)	246
在三八妇女节庆祝会上的讲话(1951. 3)	250
协助政府贯彻施行“惩治反革命条例”,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1951. 3)	252
在湖南大学学生会第三届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951. 4)	255
纪念“五四”运动与订立爱国公约(1951. 5)	259
关于改进《人民湖大》的决定(1951. 5)	265
怎样学习《实践论》?(1951. 6)	266
关于检查工作的指示(1951. 6)	279

武训是个反动派(1951.6)	281
《实践论》解说(1951.7)	283
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三十周年和《论人民民主专政》	
发表两周年而作(1951.7)	344
答李宏文问(1951.8)	357
读毛泽东同志在1926年至1929年的四篇著作(1951.8)	359
纪念九三,要向美帝国主义清算,斗争!(1951.9)	368
再论武训是个反动派	
——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以后(1951.9)	374
怎样学习党史(1951.9)	377
帮助学习党史的几篇重要著作(1951.9)	387
本期教学与行政工作的总方针(1951.10)	390
关于大学教师思想改造问题(1951.11)	394
努力思想改造,积极参加土改(1951.12)	398
读《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51.12)	402
关于《实践论解说》的几点修正(1952.1)	407
致参加土改工作全体师生的慰勉信(1952.3)	409
高等学校的“三反”运动必须结合思想改造(1952.3)	411
声讨美帝国主义者撒播细菌的兽行(1952.3)	416
湖大思想改造与“三反”斗争运动报告(1952.4)	418
从湖大“三反”运动的进展说到思想改造(1952.5)	422
纪念“六·二五”两周年(1952.6)	425
纪念“七一”,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1952.7)	429
读《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1952.8)	435
湖南大学师生员工代表会议开幕词(1952.9)	443
湖南大学师生员工代表会议总结报告(1952.10)	446
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建设新的人民湖大(1952.11)	449

湖南自修大学是训练干部的学校(1952)	451
读《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952)	453
庆祝 1953 年元旦题词(1953. 1)	460
在湖南大学欢送会上的讲话(1953. 1)	461
到武汉大学就职谈话(1953. 2)	464
高举着斯大林的旗帜前进	
——悼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1953. 3)	466
《矛盾论》——革命行动和科学研究的指南(1953. 4)	471
我们应怎样庆祝今年的“五一”节(1953. 5)	485

入党自传(节录)*

(1949.12)

1920年春季,第三国际东方局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中国。他的名字是 Vitinsky,我们替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叫作吴廷康。他是和他的夫人同来的。他以前在美国做过工人,英语说得很好。东方局认为他比较了解东方情况,所以派了他来。他说,东方局曾经接到了从海参威发去的电报,说中国曾经发生了几百万人的罢市、罢工、罢课的大运动,所以先派吴廷康到中国来调查和联络。他首先到达北京,和李大钊等数人交换意见。当时苏联宣布废除沙皇压迫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一般知识分子都对苏联有好感,所以新文化界人士到处请吴廷康讲述苏联情况,对于当时像云雾一般的苏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更喜欢与吴廷康相联系。当时充任英文翻译的人是张太雷。由于李大钊的介绍,吴廷康到了上海,首先访问了新青年社的陈独秀,任俄文翻译的人是杨明斋。当时上海著名的赞成社会主义的人,有星期评论社的沈玄庐、李汉俊、戴季陶(他后来被孙中山骂了回去)、陈望道、施存统、有共学社的张东荪。吴廷康就常和这些人相联络,讲述苏联的情况,并交换关于革命的意见。这时,设了一个外国语学校(地址是渔阳里二号),由吴廷康的夫人教授俄文。当时脱离家庭的找自由的青年学生,都被介绍到这里住下,并学习俄文。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吴廷康就劝陈独秀、李汉俊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最初本想邀约张东荪参加发起的,陈独秀认定他是研究系的,颇有旧政客的气味,所以没有约他。(他主编着《时事新报》,也曾主张社会主义,但

* 这是叶蠖生对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入党时所写自传的节录,原标题为“李达自传(节录)”,《新时期》1980年第5期曾以“党的一大前后”为题发表过其部分内容。除这份节录外,该自传的其他内容至今尚未公开。——编者注

后来在中共组成后,他开始反对社会主义了)。

我回到上海以后,首先访问陈独秀,谈起组织社会革命党派的事,他说他和李汉俊正在准备发起组织中共,就邀我参加,做了发起人。这时的发起人,一共是8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都来参加。首先拟定一个类似党章的东西,是由李汉俊用两张八行格纸写的。所谓党纲,只有“劳工专政,生产合作”8个字。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另外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S.Y.)。于是由陈独秀函约李大钊在北平组织,王乐平在济南组织(王只介绍了济南五中3个学生组织,他自己未参加),陈公博在广州组织,毛泽东在长沙组织,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东京组织,武汉的组织,是李汉俊自己回去组织的。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当时党的工作只有两种:第一是宣传主义,第二是组织工人。宣传的刊物两种:一为《新青年》月刊,是公开的,主要的是讨论社会主义,由陈独秀主编。一为《中国共产党》,是不定期刊(因没有经费,只出了两期),主要是主张社会革命,由李达主编,其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我所写的中国社会革命之商榷。至于组织工人的工作,是由李汉俊主持的,当时派李中(原为S.Y.后升为C.P.)在杨树浦进行组织机器工会,李启汉(原为S.Y.后升为C.P.)在小沙渡进行组织纺织工会。11月间,陈独秀应孙中山之邀,去广东担任教育厅长,由李汉俊代理书记,并主编《新青年》。同时,吴廷康也回到苏联去了。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用二三百元,却是无法筹措。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书社,不能协助党中经费,并且连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期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他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就与陈独秀闹起意见来。

1921年3月,陈独秀拟了一纸党章草案,寄交李汉俊,其中关于党的组织,采中央集权制,关于工人的组织,主张组织产业工会。李汉俊指斥陈独秀要实行党的独裁,而主张地方分权制,对于工人组织,则主张先组织职业工会。

他根据他的意见,也拟了一个党章草案,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就一面写信和李汉俊打笔墨官司,一面写信劝我反对李汉俊。我当时觉得党刚发起,只有那么几个同志,就闹起分裂来,未免太不像样,我只得周旋于陈李二人之间,极力弥缝他们之间的裂痕。可是李汉俊余怒未息,不肯代理书记,就把党的名册和文件交给我,要我做代理书记,我只好接受下来。当时党的工作,因为缺乏经费,都暂时停顿,只有《新青年》月刊仍旧继续出版,我们就在《新青年》写稿子。当时梁启超派办了一个名叫《改造》的杂志,登载了反对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文章(题名我忘了),同志们认为必须予以驳斥,推我写一篇文章,我作了一篇题为《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月刊上。据各地同志说,那篇文章颇有积极效果,其实现在看来,是十分幼稚的。

这一年春季,我到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部,担任编辑,校阅了我所翻译的《社会问题总览》和《唯物史观解说》。此外我还翻译了一本《女性中心说》和一本《中国关税制度论》,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月间,我和我的妻子王会悟由相爱而同居,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同志们纷纷责难,我们置之不理,但到后来,许多同志们都照样实行了。

6月间,第三国际派了马林和尼可洛夫两人来到上海。他们和我们接洽了之后,知道我们党的情形,就要我即时召开党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当时党的组织共有7个地方单位,我发出了7封信,要各地党部选派代表,到上海参加,7月1日下午7时,在上海贝勒路同益里李汉俊寓所举行第一次会议。出席的共12人,上海——李汉俊、李达;北京——张国焘、刘仁静;武汉——董必武、陈潭秋;长沙——毛泽东、何叔衡;广州——陈公博;济南——王尽美、邓恩铭;东京——周佛海。共计出席代表是12人。马林和尼可洛夫都出席。开会时,马林首先用英文演说,大意是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世界上很有重大的意义,第三国际添了一个东方的支部,苏联布党添了东方的朋友,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他在演说中,强调着要致电第三国际,报告中共的成立。他简单地致词之后,正在开始做报告之时,忽然有一个生疏人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找谁?”他随便说了一句“找某某”,我们答说“这里并无此人”,他就仓忙地走了。当时马林很机警,认为那个生疏人非常可疑,立

即命令我们赶快走避,他和尼可洛夫先走,我们也跟着散开了。果然,不到一刻钟工夫,法租界巡捕房派了两辆卡车来到同益里,立即有巡捕把住弄门,另有两个法国巡捕跑进屋内,当时只有李汉俊一人在家,他是能说法国话的,经接谈之后,才知道他们是来捉共产党的,但到处查看,除汉俊外并无别人,法巡捕房的人也就走了;这真好险,假使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了。这是因为马林用英文大声演说,夹杂着说了好几次中国共产党,被法国巡捕听去了,所以才有那一场风波。

从第一次聚会以后,代表们就寄住在博文女校内,互相交换一些经验和意见,对于党的工作如何进行,没有多加讨论。当时成为争论的一个问题,只是关于议会政策的问题。此外,大家都认为应在各地方从事组织工人的运动而已。这时候,党代表中多半带有浪漫的气氛,见面时总要谈到恋爱的故事。当时毛泽东同志却始终沉着,常常独自一人,搔首寻思,绝不他顾,同志们见了他这种神气,总说是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毛泽东同志后来做全党领袖的作风,在这时已经显露了端倪。

为了开会的安全起见,我们嘱托王会悟在嘉兴布置了一个会场。这会场是南湖中游湖的大画舫。时间从上午10时起,到下午6时。讨论的议题,主要的是讨论党章和工作方向。在党的组织方面,分中央与地方,中央设书记、宣传主任与组织主任,地方的组织也分设这三部分。宣传方面,仍照旧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机关,以《中国共产党》为秘密宣传机关。组织方面,重在工运,以上海、武汉和京汉、陇海两铁路为中心。其次,讨论宣言的草案,这宣言草案,第一句是“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接着分析中国的时局,认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和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都应在打倒之列,有所谓“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的文句,因而主张实行社会革命,建立劳工专政,中国才有出路。这个宣言,曾载于《中国共产党》第3期中。最后选举陈独秀为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于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宣布散会,各地代表分别回去。

9月间,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厅长,回到上海,专任党中央的书记,常与马林、尼可洛夫会商。当时决定,在宣传方面,仍以《新青年》为公开机关,由陈自己主持,我则继续编辑《中国共产党》(从第3期起至第7期止),另主编人

民出版社丛书(计出版《第三国际宣言与决议案》《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苏维埃论》《共产党星期六》《哥达纲领批判》等十余种)。另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主持,他干了3个月,就停办了。

10月间,陈独秀和我商议,在上海创办一个平民女校,以期养成妇运人才,开展妇运工作。我任该校校长,王会悟任主任。入校学生约30人,丁玲、王一知、王剑虹等,均由此校出身。当时任教员者为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沈泽民等。但办理不到一年,因经费支绌,就停办了。

马林、尼可洛夫几乎每星期要约集陈、张和我三人,会议一次,听取我们的工作报告。我的报告很简单,因为每一星期不能有书刊出版,再则我虽是宣传主任,而实际只是一个著作者兼编辑。张国焘把每星期所接触的两三个工人的经过,用断续而诘屈的英语,作冗长的报告。陈独秀的报告很少。因为这时的工运,在京汉与陇海两铁路方面,汉口段由武汉支部主持,北京段由北京支部主持,中央只派了1人到郑州主持,所以上海方面没有好多可以报告的资料。还有,陈独秀不住在自己寓所,另外找了一个女人往小房间,除了他隔几日来和我们相会外,我们不知道他的住处,他究竟每天做了些什么,我们全不知道。据我所知,除了他在我的寓所拿几封信回去(因为党的通信都由我转)作答以外,似乎没有什么工作。所以党和马林等会议做报告,在陈独秀是一件不愉快的工作。大概由于这样的原因,陈独秀后来大发牛性,要对马林等闹独立。他说,每月只拿他们2000多元(国际每月的津贴),事事要受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这样他接连几个星期不出来和马林等会面。我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而不与国际相联系,太闹笑话了,所以曾和张国焘几次去劝他,他个性倔强,坚持己见,好容易才劝转他,才和马林等相会。此后不久,马林和尼可洛夫就回国了,大概是要向东方局报告中国革命的情况,才回去的。

在马林等回国以前,国际来电,要中国派遣一批青年到苏联,参加东方弱小民族会议。(这是与当时帝国主义者的华盛顿会议相对抗的)。因此,党中央派了二三十个S.Y.团员去到莫斯科,罗觉(罗亦晨)等人是在这时前去的。后来张国焘把劳动组合书记部关门,也到莫斯科去了。从这时起,直到1922年5月,党中央方面除了间接指导平汉、陇海的工运以外,几乎没有做什么



工作。

1922年6月,派往莫斯科的十多个S.Y.团员归国,张国焘也带了一些英文宣传品回来了。于是召开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这时气象有些新鲜,那些青年团员学会唱国际歌,行动也很敏捷,带来了一些新的作风。他们看到我们国内这些党员俨然是学者式样,他们就送我们一个徽号,叫作“研究派”。这是确实的,我还觉得对于马列主义的研究是太不够了,还须继续努力研究下去。

8月间,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这次大会的情况,比第一次稍有进步。张国焘根据他从苏联带回的英文打字的宣传品,分析了国际的局势。同时,大家又研讨国内的局势。接着要提出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于是分为几个小组,讨论各项问题,我参加教育问题与妇女问题组,指定我为召集人,张国焘也在这一组。小组讨论时,张国焘也曾发表了意见,最后由我归纳为几条,提交大会讨论。但当大会讨论之时,张国焘首先发言,就前天我们所共同确定的几条,大肆批评。原来是根据他所带回的宣传品来批评的,他的主张当然是高超一些。我当面质问他,昨天在小组会讨论时你为什么不提出你的高见,要留到今天才发挥?他答说,昨天没有仔细想到。我听了这话,倒抽一口冷气,这阴谋狡诈的家伙,无非是踏倒别人,提高自己。这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痛切地感到“同志如敌国”,这样的作风,是很可痛恨的。但是我看了当时所发表的主张,与当时的情况相差太远,我觉得马列主义的理论仍需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一方面,我自认自己不够积极;另一方面,我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这样,从第二次大会以后,我便离开了中央,做一名普通党员了。

10月间,国际来电,主张中国只能实行国民革命。这电文很简单,我们摸不清楚。到后来,才知道这是指示中共与国民党合作,实行国民革命的。

11月间,我接到毛泽东同志来信,说他们在长沙组织了一所自修大学,要我去做校长。这样,我们夫妇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去到长沙了。

这所自修大学,确实是自修的。毛泽东、李维汉和易礼容各同志,都挂名在这所大学里。于是,我们办了一个名叫《新时代》的杂志,16开本,约100多页,是不定期刊,从这年12月到1923年6月,一共出了4期。我记得其中重要的文章,有李维汉的《观念史观批判》,有我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和《中国

革命与日本帝国主义》等篇。此外,还编了许多临时性的宣传小册子。

1923年春季,越飞来到中国,主张国共合作,实行打倒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于是中共内部发生了两种意见:一是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兼做国民党员;另一是党外合作,即共产党员不兼做国民党员。这两派主张,在党内争执了一个时候。暑假时,我去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谈起这个问题,他是主张党内合作的,似乎已经由他决定了。他问我的意见怎样?我答说,我是主张党外合作的。我的理由还未说完,他便大发牛性,拍桌子,打茶碗,破口大骂,好像要动武的样子,幸亏在座有一两位同志劝住了。我心里想,像这样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但他在当时已被一般党员尊称为“老头子”,呼“老头子”而不名。我当时即已萌芽了脱党的决心。

1924年,陈独秀的主张实现,共产党员已经兼做了国民党员了。我是不愿做国民党员的。这时候,我在湖南公立法专做学监,兼教几点钟书,上午8点到下午5点要办公,早晚要准备讲义,简直没有一点空闲。党小组开会时,往往不能参加,至多只能做点宣传的文字,或编些宣传册子。这时候,毛泽东同志已去广州,从事农运工作,李维汉和易礼容也已不在长沙。好些青年同志们,对我不加体谅。那年五一节的劳动者游行,我为校务所羁,未能参加,他们就责难我不参加实际工作。事实上,除了星期日以外,我是不能请假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把离开组织的意念,重新提出来考虑,经过一番自我斗争,终于在这一年的9月脱离了。

总起来说,我当时脱离组织的动机,不外乎下列几点:

第一,不满意于陈独秀的鲁莽灭裂的草寇式的作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研究,在1922年党第二次大会以前,他所发表的东西,只是当时一个新闻记者的文章。他和张东荪论战的文章中,对于张东荪主张中国要有资本的话,作了如下的反驳,说:“蠢才,我们反对的是资本家,不是反对资本”^①,说这样的话的人,配做共产党的领袖么?至于他在第二次大会以后所发表的东西,主要的是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代笔的,他自己并无主见,以蔡、张、彭等人的意见

^① 见《新青年》第6期。